

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yzhy83@163.com

醴陵，典籍里的得名解读

高山流水之恋

丁水生



被称为醴陵人文渊藪的深江书院



“醴陵八景”之一的“醴泉浸月”

醴陵之得名，按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的说法，是因古籍《名胜志》载：“县北有陵，陵下有井，涌泉如醴，因以名县。”而醴陵城北姜岭之麓正好有口古井，为古代著名“深江八景”之一的“醴泉浸月”。于是便以姜岭为“陵”，又有泉名“醴”，醴陵之得名似乎也因而顺理成章。

但是这里涉及一个问题：醴陵东汉置县时，县城并不在今天的城区，而是在距城10公里外的原进步乡古城村（今属板杉乡），又名“中三洲”。1987年，省文物考古部门已对此予以确认。上述得名之说也因地理方位不合而失去依据，并由此引出“因酒名县”的说法，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。那么，事实到底如何呢？

先秦典籍里的“醴陵”

解决上述问题有两个关键：一是醴陵之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？二是“醴陵”一词本身的涵义。

据东汉班固所撰《汉书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》载：汉高后四年（公元前184年），曾封“越”为“醴陵侯”。史籍虽未详述此人姓氏，却证明早在东汉置县（公元37年）之前二百多年，就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“醴陵”地名，距今已近二千二百年。故东汉由醴泉而“因以名县”并无根据，因“县”之前即有“侯国”之封名为“醴陵”。

更权威的史学大师是司马迁。他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征引地理古籍《禹贡》中的记载：“（大禹治水）又东至于醴”。一下子就把“醴”之地名出现推前到周、秦之前，比西汉封侯时又提前两千多年！古代以单字命名并非独此

一例，湖南至今就还有攸、酃（今攸县醴陵）、郴等县名。所以《史记》的史前记载固然有较多的传说因素，但醴陵之名至迟在秦或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，则是没有问题。清同治版《醴陵县志》就说：“按历代沿革，醴陵之名始于秦。”

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关键问题：“醴陵”二字之涵义。从浅层的本义来说，“醴”是指美酒或者甘泉，而“陵”则应该是指“山”。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在注疏《禹贡》“又东至于醴”这一句时，曾精辟地说出他的推断：“大阜（阜意为土山）曰陵，今长沙有醴陵县，其以陵名县乎？”此说被后世奉为权威之论。笔者认为：这句话中“以陵名县”四字，应有所确指，即为某一座大山（“大阜”）。如以近现代地理学才有的“丘陵”概念，去臆指为“醴陵”之

“陵”，则太空泛也过于简单，忽略了蕴含其中的文化沉淀和溯源考问。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地理上自北向南交替分布为平原地带和广阔的“东南丘陵”地带，地名中凡有含“陵”者，皆有具体所指。以湖南省内而论，如武陵（常德古称）、沅陵（古属常德府），是指其地背负纵贯于湘、鄂、黔三省边界的武陵山脉；另一种则是指“帝陵”之“陵”，如零陵（即永州）、茶陵和由酃县改名而来的“炎陵”，分别是指舜帝和炎帝的“陵寝”，但这一概念与醴陵无涉，所谓醴陵城北“寨子岭”一名“太子岭”，只是本土方言的讹音之转，于史实、典籍或文化传承上并无任何依据。所以在以资料搜罗宏富、严谨著称的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中，对此找不到半点采信的痕迹。

曾经的“酃醪酒”

醴陵古属盛产水稻善酿美酒（甜酒）之地，南朝刘宋盛宏之所撰《荆州记》载：“深江出醴醪康乐县，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，酒极甘美。与湘东醴醪酒年常献之，世称酃醪酒。”这证明醴陵古代产酒由来已久。盛宏之不愧是荆楚大地的深情摹写者。在他笔下水和酒是如此密不可分，似乎是说“酒就是水，水就是酒”，而且是酒味“极甘美”；特别是对其中酒名记载，他用了一个

“深”字，即名曰“酃醪酒”，这就和他所说湘东大地另一名酒“酃湖酒”完全区分开来，并且充满浓郁的深江情调。深江之滨是为醴陵，叙南朝之前历史的《晋书》曾载：晋武帝太康元年“五月丁卯，以吴酃醪酒荐于太庙”。醴陵在三国时属吴国长沙郡，此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，得其酒“荐于太庙”，足证“酃醪酒”美誉并非虚传。“醴”之为酒，源何远兮！醴陵的先民们，原来是这样充满

了浪漫的情趣。他们“筇路褰纆，以启山林”，胼手胝足辛勤开发出肥沃的湘东原野；然后在春天播下金色的稻种，又在秋天酿造醇香的美酒欢庆丰收、祈福来年。他们崇拜酒，更崇拜、热爱这条滋养了他们的深江母亲河。于是在漫长的生生不息的岁月里，他们首先创造、发现或者是接纳了“醴”这个飘逸着酒香的地名，并且执着地期待、演变着和地的另一半“陵”的结合。

山水有相逢

从司马迁笔下最早引提到而出现的“醴”，到后来终于定名为“醴陵”，这种执着和期待，可以联想为是一曲动心的高山流水之恋在孕育，犹如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，走过了千年漫长的瞻顾徘徊之路，最后终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这是山与水的刻骨相思，这是酒（“醴”）与“陵”的甜蜜相汇。所以醴陵之“陵”若是由山而得名，如果是指姜岭（所谓“醴泉”在其山麓）或者是寨子岭，就显得太局促和小家子气（寨子岭海拔仅为159米，姜岭则更低），也不符合东汉置醴陵县之初县城并不在今天城区、以及醴陵得名更在西汉封侯之前的史实。

也就是说，母亲河应该是从醴陵一座雄伟的大山中流淌出来，才是最匹配的相逢与命名。这座山就是海拔高约一公里的杨歧山，是巍巍武功山脉的重要支系，湘赣两省在萍乡、醴陵一带河流的分水岭，为当时醴陵境内最高峰，也即酃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所说“深（萍）水东出安成乡”的“翁陵山”。这个古代山名就含有一个“陵”字，和西汉桑钦《水经》称深江之源出“醴陵县东流（深）山（即杨歧山）”一样，甚至由此而和澄潭江产酒之“醴”结合为地名，或许都不无联系。但此酒应如前面所说名为“酃醪酒”，不应因《荆州记》这段话所提“乌程乡”，而扯到“乌程酒”。古代的“安成乡”，极有可能是所谓“乌程乡”是同地而异名，其地就包括有今天的湘东地区；西汉武帝时，长沙国曾在此分封过“安成侯”；三国时期，萍乡、宜春等地曾一度归吴为“安成郡”……由乡名而封国名而郡县名，“安成”之名，多次在历代史籍中出现。

悠悠萍水从杨歧山发源，蜿蜒欢歌扑向湘东大地，在醴陵双河口汇入从江西万载而来的澄潭江（深江正源），直达深口而入湘江。据典籍记载，

杨歧山以西这一片地域，汉魏六朝时都还归属醴陵——1995年版醴陵新市志亦有此载——故后来萍乡一地虽早已不归属醴陵，却长期仍存“湘东”（区）至今。这地名颇具“湘楚”遗风，其地理方位，正在杨歧山以西一带。

因此，“醴陵”之得名，其实就是概括了古代这一地区疆域的组成。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醇香的美酒（即醴，深江之澄潭江区域），雄浑的杨歧（即陵，深江之萍水区域），就这样在远古的某个时刻，碰撞交融在一起了。这是山水之恋的完美结合，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，对丰收和大地的情礼赞，以及对母亲河与巍巍东方边境大山深情的祝福和祈禱。

这又是多么悠久的历史之路。你的名字，甚至可以追溯到洪水滔天的大禹时代。醴陵之名，是一曲悠长的高山流水之恋。

涑口永积崇庆碑 记录时光深处的李公庙

郭亮

三百里深江，自江西杨歧山流出，一反江水东流的自然规律，九道十八湾地蜿蜒向西，经萍乡，过醴陵，在涑口向西汇入湘江。

因着两江交汇的缘故，涑口，自古以来便是繁盛的商业之所，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载：“（涑口）乃本县（时涑口隶醴陵，编者著）之门户，水运出入之孔道，凡属县产货物，外来商品，鲜有不从此经过者。”

繁盛的商业也造就了极其丰富的码头文化。据文史专家曹敬庄先生撰文考证，明清时期，涑口沿深江北面一条五公里长的麻石老街，有大小码头15处，忙时船只130多条，水运可沿长江水系，直达武汉、南京乃至沿海各地，时有“小南京”之称。只是，随着路网交通的发达，昔日繁忙的水运码头渐湮没在历史深处，只一些遭

存的码头遗迹仿佛仍在无言诉说着昔日繁华。

在涑口老街中段四总处的河岸边，有一处如今已废弃不用的码头，立有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，便是左近著名的李公庙码头。码头之得名，自与李公庙息息相关，据相关文史资料，李公庙气势宏大，就立于码头上岸一侧不远处，坐北朝南，河坡的八字麻石阶梯与一字阶梯交替抬升，直至庙堂正门。正门两旁石狮蹲立，双眼俯瞰深江，更显出几分威风。遗憾的是，在时光的淘换下，原本气势宏大的李公庙已荡然无存，所幸在去此不远的伏波岭庙，还存有包括涑口永积崇庆碑在内的与李公庙之兴衰有关的数块残碑，年代从清中晚期迁延至民国，零散的信息里勾勒出涑口李公庙之今昔。

李公庙与李公真人

凡立庙，必有所祀，涑口的李公庙也不例外，数块碑文显示，李公庙所祀乃是民间传说中的李公真人。李公真人是谁？伏波岭庙存有一块民国年间的重修庙貌碑，碑文显示“（李公真人）传为木客，化身飞仙于清岭山下，托影于涑水江头，漂流不去，异香勃来，令人闻之，疑乎之神……”木客指旧时码头河帮贩卖木材为生的排工，惊涛骇浪里讨生活，风险系数极高，自然会将前辈高人的传奇事迹口耳相传，久之附会成仙成圣，一跃而成行业保护神。但这也解释了李公真人成仙前的职业构成，其生平履历，仍是一头雾水。

无独有偶，涑口之外，他处亦有李公庙，如岳阳，所祀李公真人为救护众生、写出医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；攸县亦有李公庙，相关资料显示，所祀李公真人姓李，名空凡，又名紫霞，相传南宋初年生于长沙花果山，自幼学医行医，三十二岁得道仙逝。清同治年间，善化县（今长沙县）一商船装货运往攸县，途经黑石渡湘江中，忽觉水面有一重物撞击船头，船身颠簸异常，并且多次撞开

复又撞拢，船公想捞起再抛开去。但将龙牌捞上来一看，却是李公真人的龙牌。船主寻思，莫非是李公真人要去攸县，便将龙牌放在船上，到攸城后说明原委，安放在城南河岸的同仁馆内。

至于据传是李公真人出身地的长沙，李公庙就更是无处不在。长沙县湘龙街道仍有香火供奉的李公庙，即最为繁华热闹的乐和城那一块，亦留有李公庙之地名，网红美食糖油粑粑更是以李公庙之前缀频频出现在各路打卡攻略中。文史专家陈先枢曾撰文述长沙域内李公庙之流变，李公真人之生平与攸县所传相类，惟多成圣后显灵事宜，并有历代皇室册封之事，光绪年间湖南巡抚吴大澂并有《篆书李公庙碑》名帖传世，帖中即述李公真人救封事，光绪版《善化县志》中亦有李公真人显圣救民事之记载。

综上，涑口李公庙所祀李公真人，即《善化县志》或曰吴大澂《篆书李公庙碑》中所记李公真人，所谓“木客”、“化身飞仙”之说则多为流传过程的臆测和合理之想象。

李公庙今昔

涑口之有李公庙，始于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。在这之前，涑口地区已经流传有李公真人显灵于深江之传闻。在伏波岭庙收存的数块李公庙相关的石碑中，去今年代最远的石碑刻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碑文开宗明义，“李公真君显灵于涑水，历数百年矣。”考文史专家陈先枢撰李公庙流变文，李公真人显圣，多兴云降雨、救济旱灾事，最初只在李公身前的长沙花果山周边流传，至民初，长沙藩王奏请封李公真人为护国护民金紫光禄大夫，并赐“代天宣化”之匾。相传凡有灾难者，只要邀请李公，总有神灵显应且见效，自此，李公真人之信仰由长沙花果山渐渐遍布湘湖，恰与光绪十八年刻的这方永积崇庆碑所述时间吻合。

最早在涑口信仰李公真人的为深江上的河帮中人，也能理解，惊涛骇浪里讨生活，风险系数高，自然会对神道信仰之事热衷一些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河帮中人四十三人集资在深江畔建庙宇一座，祀李公真人，并于次年大修庙宇，修庙余资盘下五总河岸铺屋一栋，“召佃租”，所得则为庙宇日常运营维护费用，并在每年九月初一真人生日当天，举行大型

的祭祀仪式，此为涑口祭祀李公真人之始。

自道光二十一年始建李公庙以来，现存几块石碑显示，涑口李公庙有案可查的大修就不下于三次：一是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因庙近码头，此前所砌石质河岸在流水冲刷下日渐破败零落，进香酬愿者往来多有不便，且易发生安全事故，乃有“纠集同人募化，众姓乐善捐泉”之重修石砌河岸事，并将庙貌重整一新；二是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信士捐资购三望冲漏塘下陈式贵田一亩，所收深江岸租则为每年真人诞辰大祀之用，并将神像整饬一新；再就是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，因年深日久，兼“风雨飘摇，鸟鼠剥落”，涑口的李公庙“木则朽而少全完，石虽坚而多离动，形将倾颓”，于是众姓乐捐，“始勘垣墉，终涂丹护”，庙貌为之一新，且“巩固而壮大焉”。

遗憾的是，此次翻修数年后，1944年，侵华日军攻入涑口，一把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将涑口老街大部分建筑都付之一炬，曾经气势宏大的李公庙也在这场惨烈的火灾中化为一片废墟，只余一些残存的石碑无声诉说涑口李公庙曾有过的繁华。

碑名：永积崇庆碑
 规格：高132厘米，宽46厘米
 材质：大理石
 年代：清
 现状：藏涑口伏波岭庙



永积崇庆碑文拓本(拓印 鲁新民)

李公庙码头2012年被列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



横跨深水的深江桥



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
李公庙码头

株洲市人民政府 2012年11月19日 公布
 株洲市人民政府 2011年11月20日 立

李公庙码头简介

李公庙码头位于涑口古镇深江岸，始筑于清代，民国时期成为涑口镇重要的谷米码头，至今仍在使用。码头用麻石块铺面，现代改用混凝土部分覆盖，部分勾缝加固。长15米，宽约7米，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李公庙码头是涑口镇昔日繁荣和水上运输发达的重要见证物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。
 保护范围：码头路步外延30米。